

# 1989 年版序言

服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我国的历史文化悠久,服装经历了长期多样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各式民族服装,更充实了服饰艺术的宝库,这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工艺美术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所以,在工艺美术的现代创造思维中,应当有两个“向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由此形成了人们新的需求,新的观念;工艺美术创造,必须面向发展,面向未来。另一方面,工艺美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必须重视历史文化,重视传统;而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统并不只是被规定的了,它也是处于创造之中。所以,作为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种之一的服饰艺术,在现代创新中,也必须重视文化传统,是为了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发现内在的合理契机,以融合在新的服饰艺术中;是为了从过去那些起过重要作用的因素中,得到新的启迪,以探测未来;更是为了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去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总之,我们的服饰艺术创新,既是时代的,也是民族的,这也是艺术成熟的一种标志。

华梅同志编著的《中国服装史》,就是从以上的基点出发,运用了大量古代服饰资料,系统地揭示出我国历代服饰的艺术风貌和时代特色,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艺术出发,从美学出发,分析了服饰的造型美、色彩美、装饰美,把握服饰的发展规律;使我们从服饰艺术中看到了一个美的世界,看到了它以独特的东方美而闪烁在世界工艺文化之中。

二是重视我国多民族的特点,除了叙述汉族服饰的演变外,还详细介绍了各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色。它不仅使我们窥见了整个中华民族服饰艺术的全貌,也使我们体会到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爱生活,充满信心,发挥智能,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

三是本书行文流畅,描绘生动,图文并茂;引用古代典籍,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由于作者有多年的艺术教学实践经验,所以本书既适合广大工艺美术工作者、服饰工作者及其爱好者的需要,也适合作为服装、纺织以及工艺美术院校的教材。这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也是一本令人喜爱的读物,它为祖国工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田自秉 1988年1月北京小庄



## 前言——斑斓的史书

在人类服饰这一斑斓的史书中，中国服饰是夺目的一章。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也无例外地受到随工业文明而引发的西服东渐的冲击，但是中国曾拥有过的“衣冠王国”的盛誉是不容贬损的。它作为人类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彪炳千秋。中国服装事业的成就，不仅是灿烂的，而且是伟大的。这不是虚妄之说，而是事实。

中国人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之时，应该说就具有了服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了饰品。只不过，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生的诱惑对于人，无论古今，甚至说古人更强烈一些。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更企望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进而是一个部族的繁衍兴旺。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痕迹、一缕青草、一枝长满嫩芽的枝条都寄予着人对生的希冀。那些在骨管上刻花所透露的人的心思，那些在砾石上钻孔的耐心，都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古老文明的印迹。虽然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祖先在服饰品上的加工工艺比起今日来是落后的，但是他们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所能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难道不让我们深刻地自省吗？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在考古中发现或传世精妙绝伦的古代服饰品面前，我们常常有一种叹观止矣的感觉。原始人在服饰上所倾注的一腔热忱，可以说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因为那里面往往蕴藏着一种生命的虔诚，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人所欠缺的。

中国封建文明的巅峰是大唐，在那些宛如夏日夜空中闪闪的繁星之中，服饰是一颗格外璀璨的明星。当然，在大唐之前，中国古人已经使服饰达到相当高度，并已建立服饰制度而且出现了几度大胆改革；在大唐之后，中国古人也屡屡在服饰上用尽心机和智慧，使之更丰富地体现出政治、艺术以及多彩的民俗。我们之所以不能忘记大唐服饰，是因为唐代服饰的成就，应归功于民族文化的活力和民族经济的大交流。丝绸之路的累累硕果在唐代结成，这使大唐人饱览了异域的风采，同时又使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

这就因为，服饰是文化，它是文化的直接现实与集中表现。或许正因此，我们才可以说，服饰负载着人类的历史，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中国服装史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甚至有声的中国文化史。占来的贯口衫、深衣、襦裙、铠甲、背子、比甲的廓形完全能不假语言地叙述中国人的生活、激情与前进的步伐。青、白、朱、玄、黄更是以五色的说法连系着囊括宇宙的木、金、火、水、土，这里有着中国人对于哲学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的触角，几乎事无巨细。环佩叮当仅是美人轻移莲步吗？不，不仅是身上佩饰的组合体现着天的意志、帝王的神威，而且玉饰碰撞所发出声音的韵律与节奏，都体现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观念,即“礼”的物化与音响。

在服饰生成的最初阶段中,中国服饰与其他国家服饰基本上大同小异,这是人类童年的思维能力与定势所决定的。但是,当中国服饰立于民族服饰之苑展现风采时,世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服装的质料——丝织品,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中国大地上的蚕吞食进中国土地上的桑叶后所吐出的丝,足可以织出数不清的奇异美妙的神话。当它形成衣料时,那“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空灵缥缈,已经令人心旷神怡;染上颜色后,那“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的旖旎风光更是令人心醉;织或绣出花纹时,那“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精工巧思将人间的美好情思与向往一古脑儿予以形象的倾诉;待制成各式各样的衣服后,不管是“裙拖六幅湘江水”,还是“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都为着装者和所有人营造出一种具有东方艺术特色的绮丽华美。中国服装从“丝”开始,就奠定了与众不同的服饰形象乃至到服饰文化。

中国服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闪烁着奇异光彩的清流,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以自己的五光十色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美丽的生命的律动。更重要的是,中国服饰在世界文化中,为中国人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特有形象,至今一句“唐裤”,仍然使世人联想到中国那可以两面穿的所谓中式裤,而“旗袍”则至今在国际时装舞台上保持着独有的魅力,几乎所有人人为之倾倒。

可以使中国服装史引以为骄傲的是,中国有着广袤的大地和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各自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的服饰形象。我们今日探究哪一个民族的服饰起源,都可以听到关于这个民族的美妙的传说。用五彩衣裳编织起来的56个民族经纬纵横的中国服装史,是一部难得的气象万千的史书。中国服装史在述说着,兄弟民族长期以来的患难与共。蜀国诸葛亮在苗、壮民族感染痘疫时,毅然以柔软的丝绸送去为衣,于是“诸葛锦”、“武侯锦”就成了千余年来民族团结的佳话。

中国服装史是难以在一本书中展现出全貌的,笔者若能以斑斑点点而使读者得窥全豹,那也就是我的努力,并得到欣慰了。

# 第一章 先秦服装

## 第一节 概述

据近年来考古界考察报告,云南元谋县四百万年以前已有人类生存,这样,就将我国远古人类活动期限上推了二百万年。继云南元谋人之后,陕西兰田人、北京周口店人、山西丁村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以及内蒙古河套人等创造了早期生产工具,史称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一万年前,由于人们掌握了石器磨光、钻孔等工艺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工具改革,遂跨入新石器时代。种植、用火、定居、饲养、制陶、缝衣等项发明,又标志着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遗留至今的有河姆渡、仰韶、龙山、齐家、青莲岗等多处灿烂文化的遗址。特别是辽宁西部地区相当于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女神庙宇、冢群、村舍等大规模文化遗迹,则将祖国四千年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公元前 21 世纪,夏朝建立,使国家进入奴隶社会,夏朝如从夏禹算起,到夏桀灭亡,共传了 14 代,17 王,有四百多年历史。成汤灭夏之后,建立奴隶制更加完备的商朝,共传 17 代,31 王,约有六百年历史,直

至公元前 1027 年,商纣王被周武王推翻。周朝初建时,周都设在丰镐(今陕西),公元前 770 年,平王继位,将国都迁到洛邑(今河南),史书上将东迁前称西周,东迁后称东周。西周王朝从武王伐纣至平王之父幽王被杀,共延续 11 代,12 王,约二百五十七年。东周王朝无力维持,只得任凭诸侯势力逐渐强大,结果形成大国争霸的动荡局面,前后经历三百年,因为鲁国史书《春秋》记载了从公元前 8 世纪到 5 世纪的历史,后人习惯称此段为“春秋时期”。长期兼并的历史,使我国具备了封建社会的基本条件,再经过瓜分、取代等残酷的斗争形式,约从公元前 475 年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称雄的形势,史称“战国”,直至公元前 221 年才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先秦服装,是中国服装史的奠基阶段,一些中国服饰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间逐步走向成熟,只是年代距今过于遥远,服饰,尤其是织物质料又远不及陶、铜器那样久存不朽,因而相对来讲,资料相当少,只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某些神话传说与器皿纹饰等。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感到它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依据不足,因此只能将先秦之前的服饰发展情况拢为一章。这一种分章断节方法,很明显区别于其它美术史,这是由服饰史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为我们勾勒出人们在文明时期到来以前曾经走过的一段服饰历程。

## 第二节 中国早期服饰

人类早期服饰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真实面貌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谜。不过，从考古资料以及留存至今的仍处于原始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的部落生民，俗称活化石等形象资料来看，人类早期的服装款式最常见的是裙，然后是遮挡住前胸后背的坎肩式长衣，下摆过臀。佩饰最普遍的是项饰，其次是头饰和臀腹部垂饰。

在中国，传说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可是他们连同被认作华夏始祖的伏羲都没有留下确切的服饰形象。倒是西王母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被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我们可以依此想象，那些处于狩猎经济中的原始氏族或部族人颈间挂着虎齿做成的项饰，腰部垂着豹尾，头上披散着头发并戴着饰品。屈原笔下曾有许多生动形象。《九歌》之一的《山鬼》中便有“若有女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披石兰兮带杜衡”的句子，描绘出以树叶蔓草遮体的早期服饰形象。当然，这是集传说与想象而产生的山林女神，其服式仅可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毕竟比我们距离原始社会要近一些，况且人类确有以植物来作为服饰的实例。随着狩猎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用兽皮裹身。《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毛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虽然这是中原人以自己的口气去描述边远民族，但是他仍



图1 戴草冠、围树叶裙的女子(根据屈原《九歌·山鬼》诗意描绘)



图2 穿兽皮装的原始人(根据考古资料意想)

从出土实物来看，二万七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已懂得自制骨针，出现了缝制衣

服的发端。以后陆续出土的骨针,均可以与“斲木茹皮以御风霜,絢发冒首以去灵雨”的记载相互印证。在陕西西安半坡和华县泉护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彩陶上,留下了麻布的印痕,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还出土了三块葛布残片。而古墓中骨、石、陶纺轮与纺锤的大量出土,更加证实了至迟在六千年前即有纺织品的科学推断。至于其服装式样,可从甘肃辛店彩陶上见到剪影式人物形象,及膝长衫,腰间束带,远观酷似今日连衣裙。其形制,可从印第安人的服装中找到依据,即很可能是织出相当于两个身长的一块衣料,对等相折,中间挖一圆洞或切一口,穿时可将头从中伸出,前后两片,以带系束成贯口衫,也称贯头衫。与《礼记·礼运篇》中“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同《魏台访议》所记“黄帝始去皮服布”的年代也大体相符。传说中黄帝元妃嫫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更说明了中国远古时期的服装质料,既有葛藤、苧麻等剥制的植物纤维,也有在世界上相当一段时间中唯一拥有的蚕丝,这些决定了以后中国服饰的艺术风格。



图3 穿贯口衫的原始人(甘肃辛店彩陶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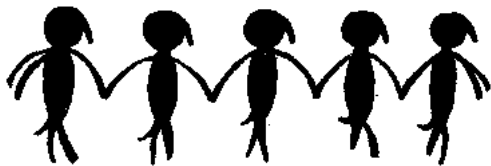


图4 佩尾饰与辫饰的原始人(青海大通县出土彩陶盆纹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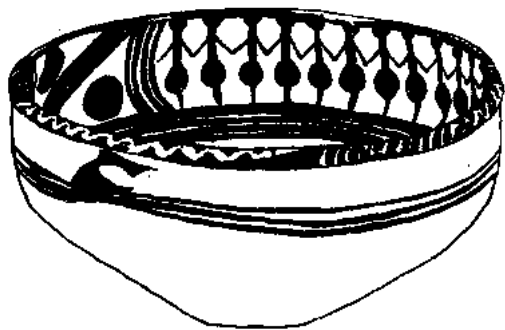


图5 穿圆球形下裳的原始人(1995年青海省同德县出土彩陶盆)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盆上,有绘出的三组舞蹈人形,各垂一发辫,摆向一致,服装下缘处还各有一尾饰。每组五个人手拉手舞于池边柳下,好似为狩猎模拟舞,即以重复狩猎活动某些过程而重温胜利的喜悦,当然也不排除舞于庄严肃穆的巫术礼仪之上的可能性。甚至后者所具有的涵义更为原始人所重视。时隔22年后的1995年,考古工作人员又在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宗日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舞蹈纹彩陶盆。这个盆的内壁绘

有两组人物，也是手拉手舞于池边柳下。所不同的是这些人物的服饰轮廓剪影呈上紧身下圆球，而这种充分占用空间的立体服饰造型在中国服饰中是不多见的。无疑，这个盆上的舞蹈人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上更有深入研究的意义。在同时同地还出土一个双人抬物纹彩陶盆，四组人物中每两人抬一物，所穿衣着似是合体长衣，但其中一人又可明显看出双腿轮廓，这种彩陶盆上的图案性质人物服饰只能使我们看到早期服饰的大致情况。



图6 原始人的项饰(山顶洞人遗址出土)

在山顶洞人遗址中，一串散放的项饰与骨针同时出土，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极大兴趣。白色的小石珠、黄绿色的砾石、兽牙、海蚶壳、鱼骨及刻有沟槽的骨管等均有精致的穿孔，这显然是以绳穿起来系于颈下的。从80年代开始陆续发掘的辽宁西部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器，有鱼形耳饰、龟、鸟等，其中最精彩的是玉质龙形佩饰，它们基本上勾勒出原始人佩饰的大体形象。除

此之外，还有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玉璜，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村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用小螺壳制成的项链，用牛肋骨制成的骨镯。山西峙峪村遗址中则发现了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等，这些都为我们探询人类早期佩饰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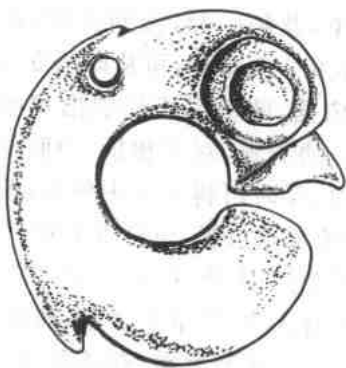


图7 青玉鸟形佩饰(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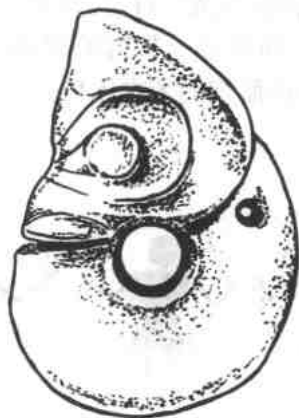


图8 青玉兽形佩饰(辽宁建平县遗址发现)



### 第三节 周代趋于完备的冠服制度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身潜力，但自然界某些现象却又一时难以理解，因而人们相信人能够创造物质，但时常受到一种力量的制约，人们要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就必须使原始巫风和图腾崇拜进一步走向完善。于是关乎社稷大事的仪式必须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用于一系列祭祀活动的服饰自然更要精心安



图9 皇帝冕服参考图(唐《历代帝王图》中晋武帝司马炎)

排。《礼记·礼运篇》讲“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正是祭祀大典，而《周礼》中“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有官任“司服”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安排帝王穿着。《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即为分仪式内容而定其服饰。“王之吉服则衮冕，享先公兪射则鹭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緇冕，祭群小则玄冕。”诸如此类规定，非常繁杂。王后在仪式上的穿着，也有专门的“内司服”来掌管。总之，这说明自周代始，中国的冠服制度已经趋于完备。

礼服规定严格，因仪典性质、季节等而决定纹饰、质料各异。从孔子“服周之冕”而言，可认为后代以周代冕服为标准服制内容。仅以最典型的冕服而言，冕服应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间束带，前系蔽膝，足登舄屨。

(一)冕冠：其板为缜。据汉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讲：“周之冕，以木为体，广八寸，长尺六寸，上以玄，下以纁，前后有旒。”<sup>①</sup>缜作前圆后方形，戴时后面略高一寸，有向前倾斜之势。旒为缜板下成串垂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旒，但根据礼仪轻重、等级差异，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分。每旒多为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冕冠戴在头上，以笄沿两孔穿发髻固定，两边各垂一珠，叫做“黹纁”，也称“充耳”，垂在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连同缜板前低俯就之形都含有规劝君王仁德的政治意义。

(二)衣裳：冕服多为玄衣而纁裳、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表示黄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纹。帝王隆重场合服衮服，即绣卷龙于

<sup>①</sup> (注)：周代一尺相当于今日 19.91 厘米。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深衣与胡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带较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之士，在思想、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学上造诣极深。各学派坚持自家理论，竞相争鸣，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及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诸学派，其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装美学思想。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文质彬彬”。道家提出“被(披)褐怀玉”、“甘其食，美其服”。墨家提倡“节用”、“尚用”，不必过分豪华，“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属于儒家学派，但已兼受道家、法家影响的荀况强调：“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法家韩非子则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

深衣：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服式。《五经正义》中记：“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具体形制，其说不一，但可归纳为几点，如“续衽钩边”，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间缝为一体。因而上身合体，下裳宽广，长至足踝或长曳及地。一时男女、文武、贵贱皆



图 15 穿曲裾深衣的男子(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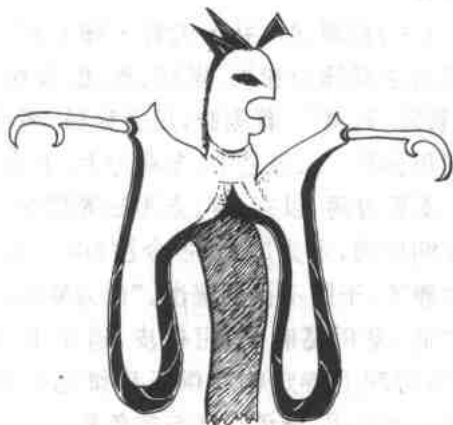


图 16 穿宽袖深衣的男子(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髹漆绘残片)



图 17 穿曲裾深衣的女子(湖南长沙楚墓出土彩绘木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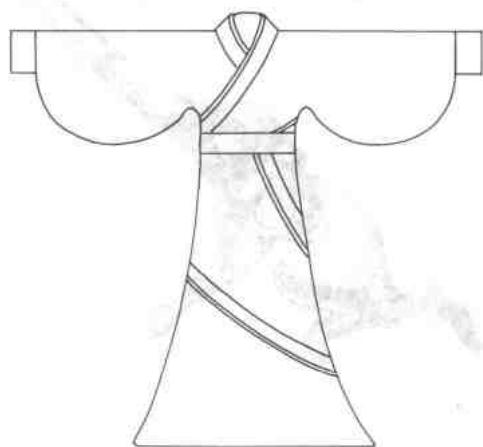


图 19 曲裾深衣示意图



图 18 穿曲裾深衣的妇女(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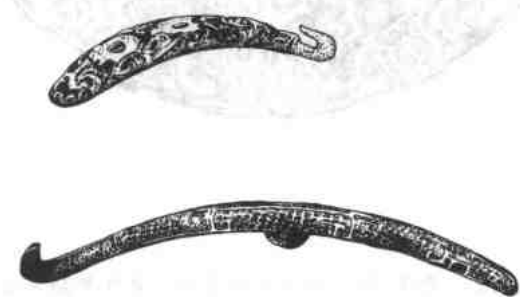


图 20 带钩上:包金嵌玉银带钩(河南辉县出土)  
下:嵌玉螭龙纹带钩(传世实物)

穿。《礼记·深衣》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袷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摎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



图 21 银猿形带钩(山东省曲阜鲁国东周墓出土)



图 22 青玉瑁(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早期墓出土)

之次也。”深衣多以白色麻布裁之，在斋时则用缁色，或有加彩者，在边缘绣绘。腰束丝带称大带或绅带，可以插笏板。后受游牧民族影响才以革带配带钩。带钩长者盈尺，短者寸许，有石、骨、木、金、玉、铜、铁等质，贵者雕镂镶嵌花纹，是当时颇具特色的重要工艺品。《史记》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已显示出服装佩饰的普遍性和工艺装饰的独具匠心。

胡服：是与中原人宽衣大带相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当然，一说为原内地劳动人民所服之式，也是可信的。所谓胡人之服



图 23 穿胡服的男子(山西侯马市东周墓出土陶范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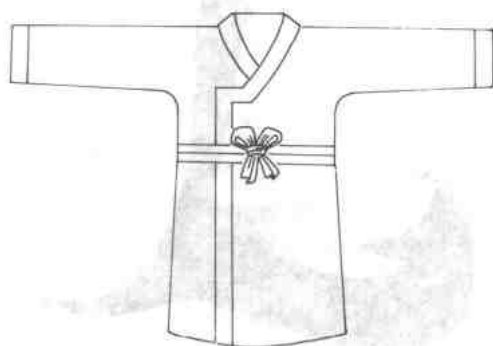


图 24 窄袖矩领胡服示意图



图 25 穿胡服的女子(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铜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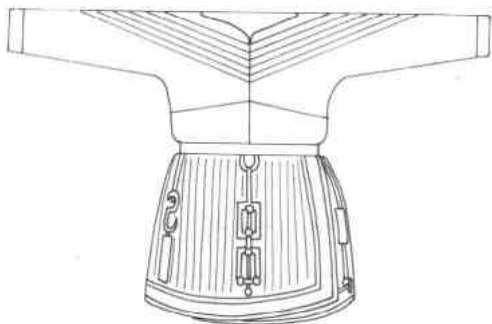


图 26 窄袖短袍加束革带的胡服示意图

的主要特征是短衣、长裤、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便于活动。赵国第六个国君赵武灵王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看到赵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胡人优良,但大多数是步兵与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加以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动辄即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灵活迅速的骑兵却很少,于是想用胡服,学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与臣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于是下令:“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后仍有反对者,王斥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于是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果然使赵国很快强大起来,随之,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兵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出土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即以简约的形式,勾画出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具体形象。



图 27 穿短袍的武士(四川成都出土镶嵌、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纹饰局部)



图 28 挂佩饰的女子(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漆绘木俑)

从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中看女子服装,当是五颜六色,因此才使“缟衣綌巾”、“缟衣茹蘼”者愈显朴洁端庄。这种淡绿巾或绛红巾与白色衣裳相配,其审美形象或许有如清水芙蓉。另如《郑风·野有死麇》中“无感我帨兮”说明扎戴佩巾在女子中也十分普遍,无论戴在头上或系在腰间。



图 29 穿襦裙的女子(河北平山三汲出土中山国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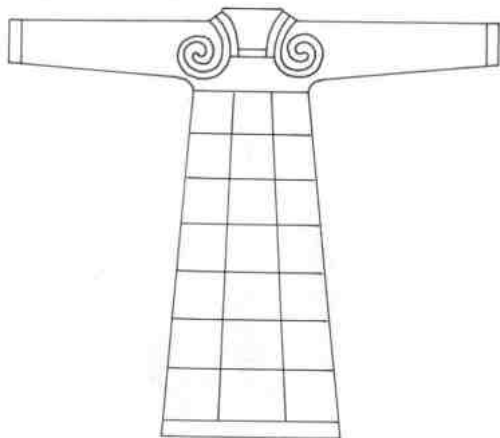


图 30 窄袖襦、方格长裙示意图



图 31 穿曲裾服、长裙的女子(四川成都出土镶嵌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纹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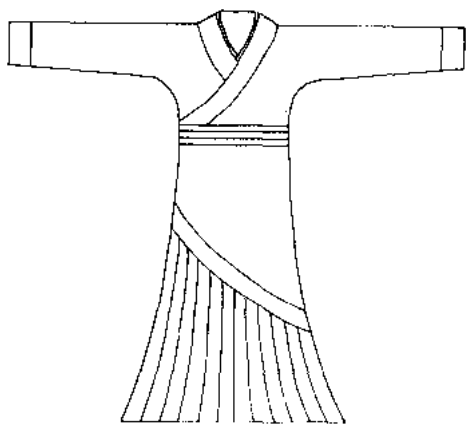


图 32 曲裾服、长裙示意图

## 第五节 小结

先秦服装在中国服装史地位中,正如三代鼎彝、战国帛画之于美术史中一样,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画者奠定了线描、散点透视、神重于形等中国传统美术风格,衣者则奠定了上衣下裳和上下连属等中国服饰的基本形制,并显露出中国图案富于寓意,色

彩有所象征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

本章重点,一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冕服制度,它产生于信天命、事鬼神、终日郊天祀地的特定时期,其形式有利于统治阶级,所以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二为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对于加强民族联系、丰富服装样式,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本章所叙内容,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因而资料零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具有一定难度。例如《易经·系辞》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等记载,我们今日只能根据一些后世间接资料进行推断。至于战国深衣,战国木俑中倒是有所显示,但是深衣形制究竟体现多少,服饰界、考古界仍有争论,直至长沙楚墓发现的两幅帛画、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深衣,才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形象资料。其它如商周时期用于各种职务上的服饰,只可从众多玉雕人物立像、玉雕人形饰、青铜人形器座、铅铸人形器座、木俑和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等艺术品上得以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多件西周玉质饰品出土。其中如西周晚期的胸腹玉佩饰,由一个玉璜下连短珩,两端以绿松石珠、玛瑙珠及玉管并列穿连成两串,各系两个玉璜,还另有一玉璜同时出土。再一件玉牌联珠串饰也是西周晚期遗物,玉牌呈青绿色,梯形,镂空作相背的双鸟纹,上端有小穿孔 6 个,系 6 串料管;下端有小穿孔 10 个,用以悬挂垂下的长串饰。共有玛瑙珠管 375 件、料管 108 件、煤精扁圆珠 16 件,计由 500 件饰件组成。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右股骨的外侧。我们从这里不仅领略到西周玉器工艺之精之美,同时也能大致断定佩饰在人身上佩挂的位置。

## 第二章 秦汉服装

### 第一节 概述

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顺应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要求稳定的政治趋势。统一,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秦王朝无休止地役使民力、加重赋役,结果导致秦室二世而亡。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面对汉初经济凋敝之状,汉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汉武帝时达到西汉强盛顶点,随后便走向衰落。经推翻篡权者王莽之后,刘秀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亡于公元 220 年,自秦统一至此共有四百余年。

这期间,秦始皇凭借“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大气势,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建立起包括衣冠服制在内的制度。汉代遂“承秦后,多因其旧”。因而秦、汉服饰有许多相同之处。武帝时,派张骞通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与中亚、西亚文化、经济的大道,因往返商队主要经营丝绸,故得名“丝绸之

路”。这一时期,由于各民族各国之间交流活跃,导致社会风尚有所改观,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规整。尤其贵族阶层中厚葬成风,这些都为今日服装研究工作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 第二节 男子袍服与冠履

秦汉时期,男子以袍为贵。袍服属汉族服装古制,《中华古今注》称:“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国语》记“袍已朝见也”。秦始皇在位时,规定官至三品以上者,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汉四百年中,一直以袍为礼服,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称之为祛,全袖称之为袂,因而宽大衣袖常夸张为“张袂成荫”。领口、袖口处绣夔纹或方格纹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口露出内衣,袍服下摆花饰边缘,或打一排密褶或剪成月牙弯曲之状,并根据下摆形状分成曲裾与直裾。

曲裾袍:承战国深衣式,西汉早期多见,而东汉时渐少。

直裾袍:西汉时出现,东汉时盛行,另一个名字为“襜褕”。张衡《四愁诗》中“美人赠我貂襜褕”句,即是直襟衣。但初时不能



作为正式礼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有“衣襜褕入宫,不敬”之语,显然与内穿裤子无裆,直襟衣遮蔽不严有关。



图 37 穿袍服、戴平巾幘的男子(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局部)



图 39 穿直裾袍服的男子(河北晋城市汉墓壁画)



图 38 穿曲裾袍的男子(陕西咸阳出土陶俑)



图 40 穿袍、戴幘的男子(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陶俑)